



# 天命之争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朱磊◎著

“再现中国历史上九个统一与分裂的案例：涉及江南、台湾、青藏、新疆、宁夏、云南等六个地区，和越南、朝鲜、蒙古等三个曾经与中国为一体但后来分离出去的国家。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根本乃是民意之争，民意即天命。”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 天命之争

##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朱 磊◎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命之争：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 朱磊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08-8149-7

I. ①天…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9748号

## 天命之争：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

作 者 朱 磊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149-7  
定 价 5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

本书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故事书。与该题材目前已有书籍的最大不同，是本书讲述了中国6个不同地区（江南、台湾、青藏、新疆、宁夏、云南）的国家统一故事，以及3个邻国（越南、朝鲜和蒙古）曾经与中国统一但后来分离出去的故事。

在讲述以上历史故事的过程中，本书力求体现以下特色：

一是视角的独特性。从国家统一的地域角度讲述2000年来的中国历史故事，改变历史故事的叙述视角，增强新鲜感和纵深感。

二是故事的趣味性。用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再现历史场景，以人物故事讲国家统独，将大部分历史上的官职、地名用现代称呼表述。

三是史料的可靠性。采用正史和主流文献资料，坚持历史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有别于“戏说”的“正说”风格。

四是文字的简洁性。既不同于历史小说的细节想象描写，也有别于历史著作的繁密学术考证，是强调可读性的“历史科普读物”。

五是评论的谨慎性。本书以讲述故事为主，间或夹叙夹议，注重普及历史知识，历史规律及点评曲直交由读者评判和解析。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本书遵循了以下观点与思路：

### 一、统一的特征

国家统一问题，从主张统一的政权角度看是统一与分裂的对立，而从反

对统一的政权角度看是统一与独立的选择，这里“独立”和“分裂”实质上是一回事，本书采用统一与分裂的矛盾视角。

从历史的角度看，统一和分裂都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或组织方式的变化过程。在某地域范围内，存在一个最高权力中心即为统一；反之，若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不隶属的权力中心则各自独立，或称分裂。

以上是就某一历史时点的静态的横截面观察。动态观察，统一的过程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地域范围由多个互不隶属的权力中心转化为具有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状态，反之则为独立或分裂的过程。

从统治集团的微观层面看，统一和分裂之争是一种关系到情感、荣誉、利益和欲望的权力之争；但从人类社会的宏观层面看，统一和分裂之争是人类对秩序和发展方式的选择。追求成为权力中心也许只是出于个人或党团的目的，但客观上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是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自原始社会，人类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更好地生存，会不断聚集，虽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加，但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人类需要通过某种组织方式来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类社会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进，从而降低合作成本，增加合作效能。

于是政权产生了，并出现了统一和分裂，还有一些介于统一和分裂之间的模糊形式，例如朝贡体制。统一与分裂何者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人类社会如何向有序状态演进，仍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 二、统一的益处

单纯从字面看，统一和分裂并不存在优劣的价值判断。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由于统一存在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规模经济的双重好处，哈耶克、布坎南、科斯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统一优于分裂。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角度看，从部落到城邦，从主权国家到全球范围的联合国组织，总体发展趋

势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

虽然统一或分裂状态下都可能出现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也都可能出现民不聊生的暴虐政权，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多数时候统一状态更易出现和平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增进民众福祉。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方面：

一是统一状态更有利于和平安全。统一状态比分裂状态避免战争的概率更大，分裂状态下出于互相防范的需要，各政权均需保持相当的军队与国防开支，总成本高于统一状态，但和平稳定的程度却远不如统一状态。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快速增长均出现在统一时期，西汉人口由 2000 万快速增至 6000 万，盛唐则至 8000 万，北宋超过 1 亿，明朝接近 2 亿，清朝超过 4 亿。而分裂时期则多因战乱而出现人口骤减，如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人口骤减 7/8，全国只剩不足 800 万人；唐末至五代纷争，人口骤减 5/8，全国人口降至 3000 万以下。

二是统一状态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统一状态下较易清除人为的政策障碍，整合市场，便利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流动，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统一政权便于开展大型公共工程基础建设，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灵渠与京杭大运河是秦、隋以统一政权的力量开凿而成，分裂时期即使有，如五代时吴越大兴水利，规模也多为中小型。<sup>①</sup>

三是统一状态更有利于民众融合。统一状态更便于民众往来，通婚通商，有利于增进相互间的感情与融合，消除敌意与对立。汉朝的统一局面融合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而十六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却使民族矛盾尖锐化，乃至出现冉魏政权的“杀胡令”造成数百万胡、汉人民的死亡。武力统一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矛盾激化和生灵涂炭，但统一后随着矛盾平息，总体好于分裂下的持续杀戮。

<sup>①</sup>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151 页。

四是统一状态更有利于共创荣耀。统一状态下的综合国力必然大于分裂状态下的各自实力，由此可以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并在此过程中享有更多的尊严与荣誉。秦汉、隋唐、明清等以统一状态为主的帝国阶段为后世留下繁荣强大的深刻印象，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也更优于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分裂时期。

五是统一状态更有利于应对灾难。统一状态下发生天灾时可以大规模调动资源对受灾地区民众进行救助，或有组织迁移灾区民众。例如西汉初年全国暴发大面积饥荒，政府令饥民到蜀汉地区就食；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水灾，汉政府为救济70万灾民“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关中大霜，民无所食，朝廷“敕令道俗逐丰四出”，就食它地；明朝洪武至永乐的50多年间，为缓解灾情、解决人地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江北旱灾较重，政府令山东、安徽灾民渡江，“前赴苏、常就食者千万”；等等。史不绝书。

统一在现代社会还有提高国际地位、保障合法权益等优势。虽然分裂政权辖区相对较小，各地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大大缩短，行政层次减少，理论上具有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但这种优势随着管理方式的改变和信息传递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在统一政权内实现。

### 三、统一的方式

统一的方式有和平自愿、武力威慑、军事战争三种主要方式。

和平自愿统一是一个政权自愿接受另一个政权的统治，或两个政权自愿合组新的单一政权。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派人深入藏区招抚政教首领，包括元朝帝师在内的大批藏族首领归降明朝，并赴南京接受统一。清朝定都北京后，统治青藏的固始汗派其子赴京上书顺治帝，表示对清政府的谕旨“无不奉命”。清政府给固始汗送去金册金印，承认他统治藏族地区的汗王地

位。西藏蒙古贵族与藏族宗教首领几乎年年遣使莅京，通贡不绝，清朝也厚给回赐。此外，清朝康熙年间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中央政府属于和平自愿的类型，但这是外蒙古在被噶尔丹的准噶尔部击溃后做出的决定。

介于和平自愿与军事战争之间的统一方式是武力威慑，即一方在另一方的武力威胁下，和平但并不自愿地完成统一。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诸侯割据的形势下，当某一势力明显强大时，其他诸侯即可“传檄而定”，这就是武力威慑的力量。例如南唐曾在北宋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自动取消帝号，宋军攻取其都城南京后，南唐各地均传檄而定。此后吴越降宋更是如此。清朝康熙年间收复台湾时，清朝水师大败澎湖郑军后，郑军在台湾本岛的数量仍为攻台清军的近两倍。但以郑克塽和刘国轩为代表的郑氏集团已经无心再战，直接上表求降，台湾本岛在未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下与大陆和平统一。

通过军事战争完成统一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常见。战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战争展示自身实力优势，使独立势力放弃分裂企图。如诸葛亮率蜀国军队南征平叛，对叛军首领孟获“七纵七擒”，叛军不仅心服，甚至为诸葛亮立有生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虽是通过战争，却能深得民心。另一种是通过战争彻底歼灭对方军力。典型的案例如秦国在运用军事手段恢复中国统一秩序的过程中，曾经坑杀赵国降卒40万，使赵国政权的军事实力无法恢复。再如清朝平定西北分裂势力的过程中，经过从康熙到乾隆近百年的用兵，最终以对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大量杀戮解决统一问题。<sup>①</sup>

历史经验中军事战争在三种统一方式中最为常见。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统一，不同于吞并或征服。统一是在某地域内恢复曾经同属一个权力中心的状态，吞并或征服则是原本不是一个权力中心合并成一个权力中心。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还原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地理版图。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12页。据载：当地人40%死于瘟疫，30%死于战争，20%逃亡，10%归降，“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蒙古族人在新疆衰亡导致此后其他民族在该地比重迅速增加。

世界范围内，一个权力中心的管辖范围主要有先占、征服、割让等方式确立，但古代与现代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其中以前常见的军事征服方式在现代国际法上是无效的。现代国际法中承认的变动方式包括民族自决、全民公决、收复失地、交换领土。<sup>①</sup>与古代相比，现代社会在不排除战争和胁迫统一方式的同时，更重视以和平自愿的方式完成国家统一，这就需要弄清统一与分裂本质上是由什么决定的。

#### 四、统一的条件

国家能否及以何种方式实现或保持统一，取决于“势、力、策”三方面要素：统一形势、政权实力和策略运用。统一形势是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客观条件，政权实力指的是政权在经济、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硬实力，策略运用是政权对软、硬实力的运用方式。如果三方面条件均不满足，国家统一无法实现。在三方面条件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如果“势”最充分，则和平自愿统一实现概率较大；如果“力”最突出，则武力威慑或军事战争实现统一可能性较大；如果前两者势均力敌，“策”的运用得当也有助取得国家统一的胜利。

统一形势包括政权的政治影响力、统一意志力、文化凝聚力、社会控制力和民意向心力。这些内容虽然无法进行量化对比，但却客观存在，类似“软实力”。古代中国人历来相信“天命”，认为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是决定政权兴亡的最重要因素。政权统治者是否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的美德，决定其是否有资格代表上天统治人民。说到底，“天命”就是政权被民众的接受程度，争取民众支持的“天命”之争本质上是政治影响力和民意向心力之争。当一个政权做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昌盛、四海归心，就具备了有

---

<sup>①</sup> 范宏云：《国际法视野下的国家统一研究——兼论两岸统一过渡期法律框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利的统一形势，追求或确保统一就成为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业。

政权实力包括经济、军事和人才等方面的实力，这些内容可以进行量化对比，是政权的硬实力。在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中，具备实力优势的一方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在没有外部政权介入统一和分裂的情况下，中央政权综合实力越强，地方政权自然受到的影响和控制也越强，当实力对比差距明显时，和平自愿与武力威慑的统一方式就可能会发生。同样，中央政权实力越弱，地方政权的分裂倾向越明显。但当某一地方政权实力足够强的时候，反而有可能由追求分裂转向追求统一，成为新的中央政权。

策略运用包括政权对统一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为实现统一目标采取的战术行动。策略运用的好坏不仅决定着统一目标能否实现，还必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幸福程度。政权围绕国家统一进行斗争的客观效果，是追求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组织形式。

## 五、统一的案例

案例一：江南的统一。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由于开发较早，历史上中原地区文明较周边地区发达，统治该地区的政权也往往成为中国的中央政权。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得到开发，统一长江中下游也就成了中央政权必须面对的任务。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元灭南宋均成功统一江南，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前秦主力部队未至长江）、采石之战（金攻南宋）则是统一江南失败的案例。

从统一形势看，前五种成功情况均是在北方政权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政权内部对统一战争充满共识和信心的形势下发动的统一战争；后三次战争则是在北方政权内部尚未达成发动统一战争共识的背景下进行的失败尝试。赤壁之战前贾诩等谋士劝说曹操不该在士卒疲惫的状态下急于与东吴开战；淝水之战前包括前秦天王苻坚最信任的弟弟、大将苻融在内的绝大多数将领均反对伐晋；金朝完颜兀术和完颜亮两次大举南下进行灭亡南宋战争期

间，均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斗。共识不足则政权意志力不强，统一的形势也就不够充分。

社会文化方面也是统一形势的重要内容。前秦攻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长期拥有更先进文明的汉族政权发起的国家统一战争，此前近百年间北方地区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造成的民族对立尚未化解，东晋民众对异族政权的认同还远远不够，由此导致东晋军队保家卫国的斗志高昂。苻坚在形势不具备的条件下急于伐晋，失败就不是偶然的。此后经过200年的民族融合与适应，鲜卑成分浓重的隋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伐陈成功，统一南北。金朝攻南宋时也还没有得到汉地民众的政权认同，当时女真族文明程度远低于汉文明，原属北宋的中原地区刚被占领，统一的社会文化条件尚未具备。辽金300余年的少数民族统治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及汉人对少数民族统治的认同，为元朝蒙古政权入主中原奠定了统治基础。

案例二：台湾的统一。台湾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重要屏障，宋、元、明时期，中央政府在澎湖派兵驻防，元、明还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包括台湾在内的附近岛屿。明末清初，中国大陆政权更迭，亡明故臣退守台湾，与定鼎中原的清政权展开了跨越台湾海峡的统一和分裂较量，最终以郑氏的归降完成了版图的统一。

在清政权与郑氏政权的斗争中，清政权抓住了有利于己的形势，利用经济、军事及人才优势，最终确定“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方针，运用正确策略完成台海统一。郑成功收复台湾4个月后病逝，同年清圣祖康熙继位，第二年清朝组建第一支海军并试图武力攻台，因遇台风而未果。此后康熙重视内政，剪除权臣，平定三藩，治黄河，通漕运，尊儒学，用汉臣，国家政局稳定，经济恢复，政治清明，民心归附，这就取得了有利的“势”。清廷利用这一形势开始重新规划统一事宜。此时台湾却政局生变，郑经一死其长子郑经即遇害，次子郑克塽继承王位，实权却旁落权臣。清廷敏锐把握时机，正确选用人才，以坚持武力平台且精通海战的明郑降将施琅为清军统帅，并

赋予专征权，以灵活策略发动统一战争，并在取得澎湖海战胜利后采取怀柔政策，倾心安抚，秋毫无犯，乃使台湾本岛不战而降。

案例三：西藏的统一。西藏自元朝起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明朝中央政权继续对西藏实施管辖，但未派驻军进藏；清朝管辖西藏期间，蒙古准噶尔部从新疆突袭西藏，吞并整个青藏高原，清军入藏击溃准军后，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在拉萨设立了驻藏大臣，直接监督地方政权，留驻藏清军数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

几千蒙古骑兵长驱直入就能占领西藏，这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1239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率军征服西藏、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占领西藏、1716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发兵吞并西藏。原因主要是自从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广泛传播，藏人便不再如吐蕃时期尚武，加之青藏高原生存条件艰苦，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通讯困难，如无外力，西藏实力难以支撑独立政权。

在维护西藏的统一和稳定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是以实力为后盾，凭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尊重与控制来影响西藏民心，也就是在“势”的方面加强藏区的民意认同。清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拨款修建寺庙、免征喇嘛赋税、差役和兵役等政策措施，与西藏民众建立了强有力的共同精神信仰，使西藏宗教领袖乐于配合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噶尔军突袭西藏之所以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准军利用西藏民众对拉藏汗更换达赖喇嘛的怀疑和不满。两年后（1718年）清军进藏也是以护送青海的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到拉萨坐床的宗教名义出兵，并赢得西藏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案例四：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占地1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北边陲，古称“西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改称“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朝前期新疆地区发生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政权为主的分裂势力近百年的军事斗争，最终确保新疆保留在中国版图。

自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至阿睦尔撒纳的几代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一

心想以新疆为中心建立与清朝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蒙古汗国，并时时有沙俄支持的背景，但清政府依靠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武力平叛，确保了新疆与中央政权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央政权越稳定、统一意志越坚定，分裂的可能性越小。康熙统一立场坚定，与沙俄军事斗争结束、签署《尼布楚条约》后，立即对噶尔丹用兵，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新疆形势就趋稳；雍正放弃对吐鲁番地区的控制，从新疆撤兵，反使新疆分裂势力嚣张；乾隆再次展现坚定的统一态度，全力消灭不断制造分裂图谋的准噶尔政权，叛乱首领阿睦尔撒纳即使逃到沙俄病死也被清政府索回尸体，最终平息新疆的分裂活动，确定了统一格局。

从上述案例中还可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其一，国家统一最终是由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如果多数人有统一意愿，且代表多数人的政权有蓬勃的生命力、坚定的意志力、清明的政治和社会凝聚力，大体就具备了国家统一的有利形势。江南、台湾、西藏、新疆的案例均是人口较多政权统一人口较少政权。

其二，国家统一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案例中五次统一江南与清朝维护新疆统一虽都是通过战争实现，但仍可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攻心为主”与“攻地为主”的区别。清朝统一台湾时，澎湖战后台湾本岛不战而降，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武力威慑统一。明初与清初统一西藏均为和平自愿方式，只有在外力介入时，中央政权采用军事手段维护西藏统一，康熙与乾隆分别派兵入藏击溃侵藏的准噶尔军和廓尔喀军。

其三，国家统一过程中策略运用非常重要。如在以战争方式进行统一的过程中，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战术制定是否正确对统一战争成败至关重要。以军事策略为例，北方政权发动统一南方的渡江战争时，能否在长江上游先取得胜利，往往影响到战争成败。三个失败案例都是在北军尚未控制长江上游的条件下发动的，而五个成功案例都是先取长江上游、共享制江权而后进行渡江统一战争才获得胜利的。秦国先据有巴蜀再渡江灭楚，西晋先有蜀汉

再渡江灭吴，隋朝先有巴蜀才渡江灭陈，北宋先灭后蜀再渡江灭南唐，元朝不惜以蒙哥大汗阵亡的代价攻占四川后，才发动襄阳战役渡江灭南宋，这些历史经验显示出军事策略的重要性。

如选择和平自愿统一方式，能否建立和强化两个政权及两个地区民众的心理认同尤其重要。这种心理认同主要包括：

一是强调宗教与习俗方面的信仰认同，如明清和平统一西藏时充分展现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认同；

二是强调执政效能、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政权认同，如北宋和平统一吴越时强调北宋政权的高效与强大；

三是强调文化与情感方面的民族认同，如南北朝时期控制北方的冉魏政权曾经想与南方的东晋政权和平统一，强调的是汉民族认同；

四是强调历史与地域方面的国家认同，如清朝与台湾郑氏谈判时康熙坚持台湾不能“独立”：“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

## 六、民族的融合

国家会统一，也会分裂，但总体趋势是走向统一。与此相类似，民族会融合，也会分化，但总体发展是趋于融合。民族的融合有助于群体的进化和发展，新形成的民族往往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就体现出这样的规律。

当一些原始的部落聚集在一起，产生共同的语言及风俗习惯的时候，也就产生了民族（此处“民族”概念不同于有人将其定义的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大体有五大族群：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位于黄河中游的炎黄族群，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则是东夷族群，黄河上游及华北地区分布着戎狄族群，长江中上游是苗蛮族群，长江下游沿海地区及岭南则是百越族群。这些族群内部还细分为若干民族。

禹（黄帝的玄孙）治水患、划九州、用青铜，标志着中原的主体民族——

夏族的逐步形成。历经夏、商、周三代，不断与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融合，至春秋时期形成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许倬云认为“华”与“夏”古语发音相同）。周朝“同姓不婚”的制度客观上鼓励民族融合，促进了周人800年的王朝统治和文明发展。

华夏民族不断融合周围的少数民族，使其成为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帝国时代（黄仁宇称其为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和元明清帝国），其开创者都有少数民族色彩，民族融合为国家强盛、社会繁荣、民族发展和文明演进注入了绵绵不绝的新鲜血液。

秦国本是少数民族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夏”。西周时期秦地长期与西戎杂处交战，因秦嬴（大骆）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立国，并赐姓嬴。后秦襄公在反击犬戎时作战有力，并派部队护送周平王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国自此逐步由戎狄之国融入诸夏。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后来居上，不但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还消灭和融合“诸夏”，一跃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英文名称 China 源于“秦”的音变（一说是辽王朝时“契丹”的音变，“契丹国”意为“大中国”）。秦亡汉兴，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使者、人民为“汉兵”“汉使”“汉人”。

秦汉以降，汉民族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不断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人口不断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众多周边少数民族在与汉族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本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魏晋以后汉族政权南迁，中国北方由不同少数民族交替统治，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当时最强大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北方主要少数民

族后来基本都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征，融合到其他民族。

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族的崛起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兴安”与“西伯利亚”皆为“鲜卑”的音变），属东胡的一支。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有两强：西为匈奴，东为东胡。匈奴分裂后，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西迁，留在漠北的10余万匈奴人并入快速成长中的鲜卑，鲜卑日益强大，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治中国北方达140余年。

北魏政权几经演变被隋政权取代，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家族有鲜明的鲜卑族色彩：杨坚祖辈世代在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为官，是鲜卑化的汉人，其父被赐姓普六茹，其妻独孤氏为鲜卑人。隋亡唐兴，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母、妻也是汉化的鲜卑人。隋唐两朝的达官显贵有很多鲜卑人，仅宰相就有20余位鲜卑人。因此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唐朝少数民族的名将显贵也不胜枚举。

五代乱世以后，中国进入南北对峙的两宋时期。宋朝是汉族人政权，中国北方的辽朝是契丹人政权，金朝是女真人政权。契丹族发源于辽河流域，根据当代相关的古人遗骸DNA研究，契丹人与鲜卑人遗传距离最近，<sup>①</sup>契丹可能源于鲜卑。女真族早先主要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女真”的意思为“捕孢子的人们”。金灭辽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元灭金后将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统统称为汉人。

开创元朝的蒙古族源于东胡，也称“狄历”“丁零”“敕勒”（也有人认为源于鲜卑或契丹，或为新兴民族）。东胡被匈奴击败后东迁，后在南北朝时期于漠北建立柔然王朝（北朝称其“蠕蠕”，南朝称其“芮芮”），呈三足鼎立之势，与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多次交战。柔然后被突厥击败，一支逃到外兴安岭地区，成为蒙古人的祖先之一室韦（一说室韦与鲜卑为同一民族Sirbi，室韦山即鲜卑山）。铁木真建立了蒙古族的统一政权，至其孙忽必

<sup>①</sup> 许月：《辽代契丹人群分子遗传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烈完成灭南宋建立元王朝的历史业绩。元朝实行的四等人制的民族分化政策常为后人诟病，但如果我们看到早先蒙古人的对手金朝和宋朝也是实行民族等级政策，就不难理解一个长期受歧视的民族强大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当然这种民族等级政策肯定是错误的，尤其不利于民族融合。

明朝创始人朱元璋一般认为是汉族人，也有人研究他是回族人<sup>①</sup>，不过朱元璋周围以回族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亲人将领众多，原配马皇后、义子沐英、悍将常遇春、胡大海、蓝玉等均为回族人，后来的郑和、海瑞、铁铉等人也是回族人。

清朝是满族人创建的政权。“满族”也称“满洲族”，这是一个长期居住在白山黑水一带的历史悠久并不断与其他一些民族融合的民族，先秦称“肃慎”，汉代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辽代以后称“女真”或“女直”，直到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才称为“满洲”。满族人统治中国近300年，满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强盛繁荣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当今中国的辽阔版图。

“中华民族”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后来“中华民族”的内涵扩大，被引申为在中国境内接受中华文化的各民族的统称，并被社会各界逐渐接受，于是“中华民族”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外蒙古独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反对国家分裂的重要旗帜。1913年初，针对外蒙古的分裂叛国行为，内蒙古西部

---

<sup>①</sup>（台）马明道：《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印行，1973年。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有脚注提到“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